****

2021第八期

（总第229期）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习近平**

一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至18日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

二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过一段名言：“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毛主席说，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这是很深刻的道理。就像军队一样，再训练有素的部队也经常要喊看齐，而且要天天喊、时时喊。当然，整队型看齐比较容易，因为那是形体上的，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看齐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喊看齐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不断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来学习培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向党中央看齐。

(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特殊时期，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0年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比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和基本准则，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关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关于坚持党性，关于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于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关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这些都要继续坚持。

(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

四

　　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要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对党忠诚，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四个意识”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上。大家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循，认真领会和正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

(2016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五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六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我们党历来重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誓词，句句都是共产党人政治觉悟的生动写照。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取得的成效，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大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七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八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革命理想高于天。江西到处传颂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革命先烈为了理想和信念慷慨赴死，靠的是信仰。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我们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2019年5月22日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十

　　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大家想想，如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人听，做不到令行禁止，那还谈什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一

　　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有了过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年轻干部必须坚守一条，凡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定不移做，凡是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决不做！要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特别是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心。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治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注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2020年10月10日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二

　　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三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四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五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十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至2021年2月期间文稿中有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容的节录。

**习近平在浙江（五）**

# —“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推动实施领导干部下访。当时您具体分管信访工作，请谈谈当时作出下访决定的背景和你们到浦江第一次下访的情况。
　　张曦：当时，全国各省信访普遍呈现上升势头，信访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在浙江，群众信访总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已成为群众信访的主要形式，越级信访、异常信访、突发性信访事件突出，择机上访日渐增多，信访活动出现明显的组织化倾向。上访内容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特殊群体要求提高政治生活待遇、村级换届、环境保护、涉法涉诉等热点问题，还有反映基层干部违法违纪、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正处于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力度加大，各类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日益增多。而浙江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先发、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改革力度大、进展快，各类矛盾和问题自然也暴露得早、暴露得多，有的甚至还很尖锐。
　　2002年10月，面对全省严峻复杂的信访形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分析研究，决定在全省实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为民谋利的基础性工作，在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是产生信访问题的源头，信访工作要到位，必须重心下移，深入基层；领导下访是新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信访工作的一种探索和新思路，也是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的一项有力措施。他提到，早在1988年，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建立了地、县、乡镇三级领导下访制度，把领导“下访日”作为领导“服务日”、“公仆日”，解决了大量问题，深受群众拥护和欢迎，《人民日报》曾作了专题报道，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后来，他调到福州工作，又把这项制度带到了福州。在习近平同志直接指导下，从2003年6月开始，我们选择诸暨市、浦江县和衢州市开展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试点工作。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搞信访试点有一定基础；浦江县虽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却是信访大县，2002年全县受理信访10307件（人）次，县信访局接访登记的案件真可谓“堆积如山”，群众越级上访，去金华、到杭州、上北京，是全省信访管理重点县；而衢州的信访情况则处于前两者之间。选择这样三个县、市开展试点，具有一定的对比参照意义。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下访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他非常重视下访前工作方案的制定，不仅认真阅看市县上报的材料，还亲自指导访前问题的摸底梳理，接访时间、场地的选择，省、市、县三级下访部门负责人的组成，接访流程、接访力量的安排，接访秩序维护、应急预案制定等重要环节工作。他几次强调，下访前要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手段大范围反复发布下访公告，让全县上下都知道，并邀请新华社等各级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他还要求下访必须注重实效，强调访后的集中调处工作，按照“谁下访、谁接待、谁负责处理”的原则实行包案办理，上一级要建立督查制度，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2003年9月15日，省、市、县三级信访局联合署名在浦江县报、县电视台、县广播站等连续3天发布公告。公告一出，全县立即轰动，老百姓奔走相告。人们说，没有见过哪一朝哪一代的“官”，敲锣打鼓地叫老百姓来“告状”的。他们纷纷报名，整理上访材料，有的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积案都翻了出来。短短3天时间，全县共有429批次、数千名群众登记报名。
　　9月18日上午8点，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市、县三级有关部门100多名负责人来到浦江县浦江中学，分别进入14个接待室。习近平同志与我及有关同志在第一接待室。第一个走进来的信访群众是县政协委员蒋星剑，反映210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蒋星剑激动地站起来，双手紧握习近平同志的手。12月18日，210省道扩建工程在村民的欢呼声中如期开工。2005年10月，全长19.8公里的210省道浦江马岭至浦阳段二级公路全线贯通。当地广大村民自发联名，给习近平同志寄去一封盖有5个乡镇、97个村民委员会鲜红印章、代表20多万村民群众的感谢信。
　　从第二批接待开始，群众反映问题的“火药味”浓了起来。有5名上访群众反映城市拆迁安置问题，听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释，群众就气呼呼地与他们争执了起来。习近平同志耐心听完双方意见，和颜悦色地给他们做工作。听了习近平同志通情达理的一番话，5名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鼓掌，其中一位群众说道：“我们对书记的答复很满意，我们农民也是有觉悟的，只要政府多听听我们的呼声，做到政策公开，安置公平公正，我们会支持旧城改造的。”
　　忙碌了一上午，接待活动临近结束，远在50多里外的蒿溪村100多名群众赶来上访，可事先没有登记，按规定不予接待。习近平同志知道后说：“人家跑那么远的路，不容易，还是把他们请进来，接待好。”后来像这样临时报名的又来了100多批，全部得到接待。一天时间下来，习近平同志和省、市、县三级100多名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定性清楚劝其息访的21件，交办落实责任的324件。接待日活动结束后，省直机关厅局和市县的负责人都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讲老实话，开始我们都有点担心，怕有群众要求得不到满足，不讲理，会出乱子。一天下来，有这么好的结果，真是没想到。”
　　采访组：浦江下访之后，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领导下访在全省推开的？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曦：习近平同志说过，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从浦江回来后，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在全省全面推开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工作。之后，他每年坚持带领我们下访。2004年9月9日，习近平同志率领有关同志到临安市下访，当天共接待群众来访267批492人次，当场解决34批88人次反映的问题，交办了172批290人次反映的问题，作出定性劝其息访61批114人次。2005年8月15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德清下访，当天接待群众来访185批296人次，当场解决40批，交办限期调处101件，解释政策、宣传教育后自动息诉44件。2006年8月15日，他带领有关同志到衢州下访，当天接访点接待群众来访167批315人次，其中当场解决76个问题，息诉与交办91件。
　　习近平同志还先后在“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多篇关于下访工作的文章，通过短小精悍的评论，向全省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有力地统一各级干部思想，指导下访工作的开展。
　　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省、市、县各级领导进一步把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一级带着一级层层抓落实。2003年12月23日，在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和吕祖善省长与11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首次签订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此后，不单目标管理责任书一年一签，每年还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把信访工作纳入创建“平安市县”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赋予信访部门对受理的信访件有交办、督查、协调和建议追究责任等职能。深化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修订了《浙江省信访条例》。每年都制定年度县（市、区）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分办法。直到习近平同志赴上海工作前两个月的2007年1月28日，他还与各市签订了当年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在习近平同志连续5年直接推动下，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取得明显成效。2003年至2006年8月，省领导先后86人次下访到42个县（市、区），会同市、县领导一起接待处理群众信访近1万件（人）次，办结率96%以上。省领导每年下访，带动了市、县两级党政领导经常性下访。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市、县党政领导共接待群众3.1万余批次9.5万余人次信访。2005年，全省信访总量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浙江群众进京上访量明显下降，集体上访量也明显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聚集省政府大门口的上访由2003年的227批下降到2005年的38批。浙江群众非正常上访量从最多时的全国排名第3位后移到2005年的第30位，是全国各省区市非正常上访量最少的地区之一。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连续数年在《浙江日报》发表“之江新语”系列短评，引起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请谈谈他做这件事的最初设想以及具体实施的有关情况。
　　张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2003年1月14日，在全省宣传工作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表彰会上，他提出宣传思想战线要打好主动仗。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组织新闻媒体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在重要版面、黄金时段开辟专栏专题专访，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出一批有深度的社论、评论、言论和理论文章，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平时，习近平同志也要求省委办公厅通过《浙办通报》《今日浙江》等渠道发布工作信息，公告省委省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多次指示我们，组织宣传是办公厅服务省委工作大局的一个重要职能，省委办公厅要把省委的声音及时传送给新闻单位，使各类媒体共同唱响省委的主旋律，推动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当时，中央和省内新闻媒体都想采访习近平同志。因此，凡经他同意的，我们都尽量安排时间。特别对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时政记者周咏南同志给予更多“特权”，许多重要会议和考察活动都安排他参加，很多时候还安排到“一号车”。
　　习近平同志工作作风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凡是叫大家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浙江日报》开设“之江新语”专栏就是他这一作风的充分体现。他坚持在4年多时间里为这一专栏撰写稿件，充分体现出他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以正确言论引导社会舆情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风格。
　　采访组：当时“之江新语”专栏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内容上有哪些鲜明特点？
　　张曦：“之江新语”专栏相对固定设在《浙江日报》头版左下角的位置，篇幅不大，但设计十分醒目，很有特色。栏目刚设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短评是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后来，越来越多干部发现这些短评与习近平同志近日报告或讲话中的重要内容非常一致，这才明白“之江新语”中的评论都是由习近平同志主笔，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干部和读者关注这个栏目。通过这些短小精悍的评论，他们及时了解了省委书记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进一步深入领会省委的重要部署，更有力地推动全省工作的开展。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取名《之江新语》。
　　《之江新语》选编的每篇文章，可以说都是习近平同志有感而发、因时而作，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针对性与思想性。就像当年毛主席的瑰丽诗作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一样，习近平同志的这些短文都是他深入田间、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调研的成果，都是他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部署、创造性地推进全省工作的思想结晶。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些文章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闪耀着习近平同志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光辉。
　　《之江新语》的文章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充分体现了他“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每篇基本控制在300—500字，可读性强；观点清晰敏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形式生动形象，善用比喻与案例，讲道理深入浅出；文风朴实动人，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谋利的意识，老百姓看得懂而且喜欢看。俗话说“文如其人”，现在重读这一篇篇评论，就像当年习近平同志面对面地与你讨论、谈心一样。《之江新语》的内容涉及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方面面，“八八战略”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循着文章发表的时间线索，不同时期又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但总是围绕着省委中心工作及时发声。2002年10月，他一到浙江就进行密集调研。2003年2月10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调查研究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作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讲话。他在《之江新语》的开篇之作《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就来源于此。之后，他还写了《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等文章。2004年1月29日，他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就“求真务实”狠抓落实问题作专题发言；2004年2月2日，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又提出要“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确保完成‘狠抓落实年’的各项目标任务”。随后，他于2月3日、8日、23日、26日、27日及3月3日、8日、18日连续在“之江新语”专栏写下《求真务实要出实招》等八篇文章。2004年5月10日至11日，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紧接着5月17日、5月19日，他连续发表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样是政绩》《要“平安”，不要“平庸”》。2005年7月28日，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他作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力量》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他于8月12日、8月16日发表了《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谐》。在2006年10月30日，他又发表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3月25日，“之江新语”专栏同时刊登了习近平同志的2篇短论：《“书呆子”现象要不得》和《追求“慎独”的高境界》。同日出现在《浙江日报》头版的，还有题为《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新华社电讯稿，十分醒目。大家不难推断，习近平同志在调离浙江前夕仍然十分关心“之江新语”栏目。他对全省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是令人感动！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思考。连贯起来学习，《之江新语》又显现出高度的思想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可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天地之大文章”，忠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浙江美术馆就是在他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关心指导建设浙江美术馆，是习近平同志推动浙江文化建设的典型事例，也是他领导作风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浙江是个美术大省，宋元明清大家辈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涌现出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八五”“九五”期间，曾不断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设浙江省美术馆的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已将这项工程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这件事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2002年2月1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中国美术学院，建议浙江建一个一流美术馆。4月29日，省委召开浙江美术馆建设专题会议，议定美术馆馆址选在杭州西湖风景区长桥公园对面、玉皇山麓地带，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省财政拨出专款，由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牵头，成立美术馆建设协调小组。
　　筹建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开展后，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产生。由于美术馆拟选地址位于规划严控的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内又有省军区通讯连与杭州市的一个停车场，涉及部门众多，动迁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省、市和军区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协调，还得积极争取有关专家学者给予有力的论证依据。基建组的同志们为此十分发愁。
　　记得2002年11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刚任省委书记不久，我趁空隙向他简要报告了筹建美术馆遇到的困难。这件事立即引起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他明确表示新官要理旧事，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并且要切实加快工作进度。基建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精神为之大振。
　　2003年1月31日是农历除夕，一大早8点半，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市主要领导及有关负责人冒雨对美术馆拟议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在就近的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会议。他明确指出：“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美术大师和人才辈出，中国美术学院又坐落于杭州市，浙江美术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美术馆建设意义重大，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都很重视。这是一个既定的决策，我们要继续做下去，抓紧工作，尽快实施启动，抓好落实。”
　　之前，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应该建在西湖边上。他还指出，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
　　2004年初，美术馆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这时已接近春节放假，省委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但习近平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关心研究美术馆建设。1月5日，从早上8点半开始，整整一天是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傍晚，会议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即领着所有常委走进隔壁的小会客厅，仔细审看美术馆的三种建筑设计方案图与模型。他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终于“拍板”，确定了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程泰宁建筑设计事务所程泰宁教授主持设计的充分体现中式建筑风格的方案。
　　2005年5月15日，浙江美术馆奠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习近平同志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7年底，浙江美术馆顺利竣工，2009年8月正式开馆运行。浙江美术馆从“八五”期间动议至“十一五”期间最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落成，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十分重视和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我到浙江大学工作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是该工程第一期项目。项目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段攻坚期，都离不开习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2005年，为响应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号召，我们经过反复商量论证，于6月8日正式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宋画藏品的建议。因为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宋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瑰宝，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亟须汇集整理。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印制工艺，完整地、高质量地出版宋代绘画集，是国内外艺术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浙江杭州是南宋故都，见证了当时的文化繁盛，有责任整理出版宋画。习近平同志接到报告后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同时，他还让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敏尔同志与我们研究一下，提出一个推进实现的方案。
　　在习近平同志直接关心下，第一笔启动资金很快下拨。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浙江大学工作，他不时会关心地问起《宋画全集》项目。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去上海履新前夕亲切接见我，还勉励我们要确保质量完成好这个项目。
　　2008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座谈会。我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会议，随身带去了赶制出来的《宋画全集》样书稿，会前送给了他。7月17日，我书面向他详细汇报了《宋画全集》的实施情况，同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审定了序言并批示：“《宋画全集》编纂工作开展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12月11日，我去中南海参加由习近平同志主持的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会后，他问起我的近况，我又向他报告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2008年12月28日，《宋画全集》正式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2010年9月，《宋画全集》按计划基本出齐。9月13日，我写信向习近平同志汇报，建议在《宋画全集》完成后，拓展实施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在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9月21日，习近平同志批示：“获悉《宋画全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收到了这个批示后，项目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十分清楚，做好这项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而难度更大。中国绘画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搜集、梳理并高精度地出版这样浩瀚的大型图像文献。大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同志的郑重嘱托。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同志飞抵浙江舟山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第一次到浙江考察调研。26日晚上，他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仔细翻阅“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样书，详细听取了有关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下午，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
　　根据5月26日晚我向习近平同志请示情况，8月10日，我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工作向他进一步作了书面汇报。8月20日，他给中宣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四位主要领导作出了重要批示。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如此关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真是令我们终生难忘！
　　12年来，这个项目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心血，充分展示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全情支持，对大规模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他一以贯之尊重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传承的人文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无论在哪一层级领导岗位上，都高度重视并坚持读书学习。请您谈谈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是怎样坚持学习的？
　　张曦：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习近平同志日常工作的繁忙程度不言而喻，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抓紧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这里我想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与三位学者学习交流的故事。
　　习近平同志对宗教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就强调：“福建宗教问题这么集中，宗教部门要研究，要摸索出规律，探索管理办法。”浙江与福建毗邻，同样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和门类众多的宗教流派。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后，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2004年初，他决定适当时候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为此，他在大力推进“八八战略”工作的同时，不断了解全省宗教工作情况，几次要省委办公厅与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相关材料。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宗教、抓宗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宗教工作动态，认真指导和协调做好宗教工作。仅在杭州市，他就专门腾出整块时间带着我们专程走访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与灵隐寺、抱朴道院的佛教、道教界人士交流，到省民宗委听取工作汇报。
　　习近平同志十分清楚，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为了从认识论层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2004年春节后，习近平同志叫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约请两位学者深入讲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间各为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西方哲学史学者陈村富老师和省社科院中国哲学史学者吴光同志。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来请示事先是否要审稿，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答复：“不审稿，放开讲。”讲解时间安排在4月15日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吴光同志因时间有冲突，当时没有安排上，陈村富老师约定在4月7日。
　　那天下午3点，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和我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进门就与陈老师热情握手，并示意他请坐，然后打开笔记本听他开讲。陈老师讲课经验丰富，他的“开场白”是：“我没写讲稿，没带一个字的书面材料。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也可以是讨论式的，您提问，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就按他事先考虑的方案讲。陈老师从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及其文化背景、所应把握的基本线索、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当今学者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在讲述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纠正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并重点介绍了《野蛮的欧洲：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后800年》这本书。说到这一段时，习近平同志插话与陈老师交流荷马史诗中说的特洛伊城。当讲到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时，陈老师提到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受教学大纲束缚，围着基本概念、原理和运用题转；另一个是不少教师缺乏哲学史的观念，缺乏文化史和新兴学科的知识。这时张浚生同志插话道：“现在学校的政治课确实是个问题，学生不爱听。”习近平同志点头表示：“这个问题要研究。”陈老师是福建龙岩人，他的福建“普通话”让同是福建籍的张浚生同志听起来也有些吃力，但习近平同志笑着表示听得懂。他给我们解释，过去他已经看过不少西方哲学史著作，对这些专业术语都很熟悉，加上他在福建工作生活17年多，接触过各地方言。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原定两个小时的课程陈老师不知不觉讲了近两个半小时。事后，陈老师告诉我：“大凡开设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凭借多年形成的职业本能，就能对听讲人的专注度、理解力、学问功底和特点，做出一定的判断。习书记这位‘特殊学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笔记比我们在校的研究生都勤快、认真。从他的落笔和表情，可以推测他不仅记要点，而且关注我提供的破除旧观念的新信息。”
　　虽然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前没能安排上听吴光同志的介绍，但习近平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让省委办公厅联系，最后把讲课时间确定在6月6日。那天下午3点，吴光同志来到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重点介绍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二是“浙学”的内涵、当代定位及其现代价值。同时，吴光同志对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同志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做笔记，偶尔插话交流，如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多层含义，“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等等，还询问了省社科院办公用房等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了如指掌。每到基层调研，总会不时与大家聊当地的人文掌故，一次他提起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还诙谐地给我们讲：“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平时，他对南宋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浙东学派”以及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和著作也十分重视。他曾说，王阳明以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是有清一代浙江学人理性自觉、思想解放、富有创新的最重要代表；而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言。2006年4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专门向会议组委会发去亲笔签名的贺信。
　　2006年初，我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四月间，省委办公厅来联系，要求推荐一位老师给习近平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我们上报备选名单后确定为郁建兴老师。因习近平同志临时有重要安排而两次改期，最终定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在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听讲。郁老师讲完回来后，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他向习近平同志介绍了四部分内容：辩证法的起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他先讲了辩证法的语言学起源和它的存在论起源，花了较大篇幅讲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又介绍了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家卢卡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中坚人物哈贝马斯，还有美国当代思想家詹姆逊等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郁老师讲了两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又与他讨论了大约40分钟，并了解了当前国内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时隔多年，参与过这三次小型学习交流会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好学，对相关知识有长期的积累；学习交流前，都是“有备而来”，不仅听得格外认真，边听边记，而且还不时结合浙江实际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各类问题与他们探讨。种种情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来源：《[学习时报](http://paper.cntheory.com/html/2021-03/01/nw.D110000xxsb_20210301_1-A3.htm%22%20%5Ct%20%22_blank)》

湖州老干部最美系列

**红色讲师董小白**

 —记最美银耀志愿者 董小白

董小白：男，1941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1959年8月参加工作，42年一直坚守在教学工作第一线，先后担任过乡镇中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长兴职业高中副校长。1984年被评为省优秀教师，之后又多次被评为县、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市二届人大代表和县七届党代会代表，1988年先后被评为县、市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201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和省最美老支书等荣誉称号。

董小白一辈子倾情三尺讲坛，如今四世同堂，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始终不忘家国情怀。他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为了教育子孙规范言行，勤谨做人，定下了“诚、善、勤、慎”四字家训和十二条家规。2016年12月，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长子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在注重家教家风的同时，他不忘关心关爱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积极参加各类宣讲、大手牵小手、环境保洁、文明宣传等志愿活动。2017年，先后在农村、街道、社区、机关单位、学校，省、市、县有关活动现场，自己的农家小院“省一居”等场所，向中小学生、机关干部、教师、党员、家长、广大市民等宣讲家教家训。在宣讲的内容方面，他主要是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切实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弘扬传统美德、践行家训家规、传承家教家风”等。几年来，累计宣讲达80多场次，撰写讲稿20多篇， 约五、六万余字。

2001年9月退休后，到2017年一直担任校退教党支部书记，2007年起又兼任校关工委主任。近七年来，每年为学校4-6名特困学生捐资助学。在退协会长工作会议上讲了“退协工作要三坚持、三认真、三积极”的观点。三坚持就是传统的好做法坚持做；三认真就是会员关心的事认真做；三积极就是与退教有关的工作对社会有益的事一定积极参与。

他常说：生逢盛世倍感幸运，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像他们这些耄耋老人，一定要感恩伟大的时代，传递正能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